

名作欣赏杂志 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我们早已无法回到未开化状态，因而只能“被迫与书一起生活。但生命太短暂了，以致我们只能选择和那些最伟大的书活在一起”。所谈之书虽出于古而实存于今，所有对过去的解说，都根植于现在，而且指向未来。如此古今贯通的阅读方式，可以消除阅读古典的畏难情绪，直接把古书读到今天。

2015 年

书评选粹

黄德海 郭君臣_主编

2015 年

书评选粹

黄德海 郭君臣_主编

名作欣赏杂志 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2015年书评选粹 / 黄德海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78-4673-8

I. ①2… II. ①黄…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4091号

书 名 2015年书评选粹
主 编 黄德海 郭君臣
责任编辑 赵 勤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98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673-8
定 价 39.80元

目 录

第一辑

- 3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
——为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而作 / 刘小枫
- 16 有轨电车的道德分叉 / 赵汀阳
- 27 理想到生存：法的正义性演变 / 林国华
- 30 新春秋时代的秩序与“识时务者”的世界 / 刘仲敬
- 36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成书经过 / 张文江

第二辑

- 45 古旧文化土壤中新思想的萌动
——荷马史诗与希腊文明的理念基础 / 陈中梅
- 58 十字路口的佩耳塞斯
——《劳作与时日》的修辞与谋篇 / 吴雅凌
- 70 克塞诺芬尼的哲学与诗歌 / 娄林
- 81 “双面”托马斯·莫尔 / 杨晓雅

90 《大宪章》：强迫出来的自由基 / 石恺蒂

第三辑

- 99 不许回望所多玛 / 冯象
107 欢喜佛与双修法 / 沈卫荣
123 奥姆真理教犯了思想罪？ / 姜建强
132 一瞬的历史与摄影史的一页 / 张承志
140 阿拉伯的梦幻宫殿 / 秦隶

第四辑

- 151 革命与传统之间 / 李炜 著 / 于是 译
162 楼顶上的狐狸 / 黄昱宁
169 从日本看中国
——吴汝纶东游小记 / 陆建德
177 最后的巨人 / 张经纬
182 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 张新颖

第五辑

- 195 家族、宗族组织与乡村
——写作《家人父子》札记 / 赵园
206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 王汎森
223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纪念唐文治先生一百五十周年诞辰 / 陈尚君
236 徘徊到纠结
——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
/ 葛兆光

第六辑

- 247 王国维旧藏西方哲学书十种 / 高山杉

- 252 王国维西方哲学藏书拾遗 / 高山杉
- 254 对科学来说,理解世界远比寻找答案重要 / 卢昌海
- 266 浪漫时代:科学之美丽与恐怖 / 马慧元
- 277 现代版蜜蜂的故事 / 熊秉元
- 285 朋友圈的邓巴数魔咒 / 辉格
- 290 美国KIPP:让穷孩子学会自控 / 万维钢

第一辑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

——为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而作

/ 刘小枫

1690年，出身于伦敦的英国文人、资深政治家坦普尔爵士在伦敦发表了《论古今学问》一文，对崇今派发起主动攻击，引发了伦敦的古今之争。坦普尔眼力敏锐，他看到崇今派的内在冲动是欧洲新兴王国的崛起，力图摆脱欧洲古典传统和古典德性的规制。他在《论古今学问》中说，西欧的日耳曼诸王国仅仅在近两百年才开始出现自己的学问，与古希腊罗马学问相比——更不用说与东方其他古老文明国度的学问相比——只能算是学问上的幼儿：“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欧洲西部地区在学问和知识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超过了过去那些在学问和知识上繁荣时间更长的国家；这只能证明，我们过去的水平有多低，而不能证明现在的水平有多高。”

从当时的语境来看，“繁荣时间更长的国家”这样的说法意味着，就政治制度的优劣而言，欧洲西部地区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未必等于英格兰新政制的“水平有多高”。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按孟德斯鸠的说法，这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民主政制。对于坦普尔来说，英国的现代政制创新未必是“巨大进步”，民主政制相比于传统政制未必“水平有多高”。坦普尔在做比较时把我们中国也扯进了论争：

古代中国人就自然哲学写了大量著作；他们伟大而知名的孔子与苏格拉底差不多同时代，与苏格拉底一样，他也是开始改变人们对自然无休止、无意义的思考，让他们转到道德思考上来。然而，他们有一点不同，希腊人的重点似乎在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中国人则重视王国或统治的良好状态和幸福，众所周知，这种统治已延续了数千年，完全可以称之为学士的统治，因为其他人无权管理国家。

与此相反，崇拜英国新政的崇今派必然会贬低中国的古代政制。1748年，崇英的孟德斯鸠在日内瓦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影响也最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思想史家伯瑞称之为“启蒙时代”的真正标志。在比较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大政体类型时，《论法的精神》专门以古老的“中华帝国”作为专制政体的样板，一反当时的传教士和智识人把中华帝国视为君主政体的典范和对中国古代政体的赞美：

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在最初那些王朝统治时期，疆域没有现在那样辽阔，专制精神可能略微逊色。可是，如今已非昔日可比了。

一般认为，伏尔泰虽然是启蒙文人，但他对古代中国的态度显得较为肯定。其实，在涉及古今经典绎读之争时，伏尔泰仍然立场鲜明地贬低古代中国：

中国人在我们通俗纪元前两百多年就修筑了万里长城，这道城墙却也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万里长城是一座由恐惧和不安而产生的巨大建筑；（埃及的）金字塔是一些虚荣和迷信的遗迹。长城和金字塔都证明人民的巨大耐心，却并不说明任何高等的建筑艺术。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埃及人也好，都不会塑成一件像现今我们的雕塑家所塑造的人像。

在我国当今的诸多知识人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式的品评古代中国的姿态仍然时可见到——这仅仅表明，古今之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展开而已。

伦敦的古今之争刚刚展开，坦普尔就在1699年1月去世，接替他继续抵抗崇今派的是他年轻的秘书斯威夫特。三十岁的斯威夫特写下了题为《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的寓言小品（篇名全题《上周五发生在圣詹姆斯图书馆里的古书与现代书之战：一份完整的纪实》，通常简称《书籍之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采用伊索寓言笔法描绘发生在皇家图书馆里的古书与现代书的激烈战斗，隐射当时仍在持续的激烈论战。

不过，《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完成后并未随即出版。1699年1月坦普尔去世后，斯威夫特离开伦敦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帕特里克教堂担任总司铎。1701年，斯威夫特匿名发表了小册子《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与争执》。这篇论说文共五章，从讨论古希腊罗马的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入手，过渡到集中讨论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引发的政争，以及由此引出的僭政问题。在斯威夫特看来，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在任何时代都难免，最好的政制是权力均衡的政制或者说混合政制。在总结古希腊罗马政争的历史经验时，斯威夫特认为首先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

国家的权力均衡一旦正式确定，最为危险和愚蠢的做法是对于民众最初的夺权行为做出妥协。这样做通常是为了逃避无理取闹，以获得安宁，或者把妥协当作仅供买卖的商品。这等于拆掉整体去满足一时之需，是江湖庸医的止痛疗法，将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迁就孩子，他会顺从满足；稍微迁就一下恋人，她就会满足，不再有其他要求，于是希望用小小的让步使民众满足。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哪一个公民大会，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它在起初夺权时得到了一点点满足就从此安于现状，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公民大会曾经清楚、提出或宣布他们的权限，那么我们才有希望通过思考、讨论和辩论调整权力均衡。然而，既然所有事实显而易见均非如此，我认为，在稳定的国家里不必要采取其他措施，那些被托付重权之人应该持之以恒，坚定信念，永远不要让步于民众的无理取闹，不要使国

家有一丝的裂痕，否则无数的权力滥用和争夺迟早必定强行涌入。

这些话是针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英格兰政争而言的。论文最后一章直接讨论到英国的当前政制问题，文中出现得最多的是“民众僭政”这个词。在斯威夫特眼里，晚近半个世纪的英国政制变革证明的是一个古老的法则：“先是迎来了民众的僭政，然后是单个人的僭政。”这篇论说文看起来与当时的“古今之争”没关系，其实不然。毋宁说，斯威夫特才真正看懂了坦普尔的《论古今学问》。事实上，这篇论说文彻底挑明了《论古今学问》所隐含的论题，而且通篇都在比较古希腊罗马的政争与现代英格兰的政争。议会民主制对西方人来说的确不是现代才有的，古代的雅典和罗马都有平民议会建制。对此斯威夫特的看法是：“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重大议事机构有时抛出无知、鲁莽、错误的决议，常常让我感到诧异。这使我意识到，民众的议会也会犯个人所能犯的所有问题、蠢事和邪恶。”与如今的我们喜欢用古代史例来论证民主政制的优越相反，这篇论说文用古代史例来论证民主政制的品质低劣，并进而证明英国的民主革命品质低劣。虽然这篇论说文以史带论，斯威夫特的论析实际上依傍的是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城邦不是由有卓越德性的人统治，那么，权力“必然成为你争我夺的东西，这种产生与自己人之间和城邦内部的战争必将毁灭这些人和其余的城邦”。在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中，今人的确找不到对民主政制的颂扬。因此，贬低古典作品，才能更顺当地为现代民主新政提供论证。

1704年，时年36岁的斯威夫特出版了长篇寓言体作品《木桶纪事》（又译《木桶的故事》），一同付梓的还有《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和《圣灵的机械作用》。作为坦普尔的学生，斯威夫特清楚意识到，眼下的古今论战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古今政制之争。在《木桶纪事》的“序言”中，斯威夫特把霍布斯称为“我们时代具有威胁性的才子”——第九节的标题《关于共富国中疯狂的起源、用途及其改进的离题话》，据说针对的就是霍布斯《利维坦》的书名。《木桶纪事》问世二十多年以后，斯威夫特又发表了篇幅更大、寓意更为深远的《格利佛游记》（1726）。这部传世的经典之作是斯威夫特对“古今之争”所做的更为透彻的思考，堪称“古今之争”时期最为深刻的政治哲学著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它则是最令我们尴尬的

“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我国教育部如今已把这部作品列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义务教育部分”推荐书目，印数相当可观。由于这部“世界文学名著”采用的是寓言文体，要概述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非常困难。一方面，寓言式的叙述使得这部作品据说看起来像是“深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读物”；另一方面，书中大量涉及的政治、宗教、哲学、历史知识，显然又不是“儿童”们感兴趣的东西。事实上，就内容而言，《格利佛游记》与比它晚出二十二年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属于同类性质，两者都是政制比较之书，差异在于，《论法的精神》推崇现代式民主政制，《格利佛游记》推崇古代式君主政制。不妨说，这两部书是崇今派智识人所推崇的现代式民主政制与崇古派所推崇的古代君主政制的品质对决。

《格利佛游记》中的主角格利佛是英格兰人，按书中所记叙的出海时间推算，他应该出生在“共和革命”之后、“光荣革命”之前，上过剑桥大学。《格利佛游记》以第一人称形式分四卷记叙了格利佛作为外科医生四次出海远行的奇遇。显然，格利佛作为英格兰现代知识人的身份是整个作品的支点，在他身后是被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视为人类理想政制的样本：英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

格利佛第一次出海远航流落的地方是一个名叫Lilliputia（利立浦特）的“小人国”，因为那里的人渺小委琐，政体的品格也渺小委琐。无论是18世纪的读者还是今天的读者都能看出，这个“小人国”就是“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如今我们所追慕的两党政制，在格利佛眼里不过是高跟鞋党与低跟鞋党之间委琐的争权夺利，各自都得靠扫街拜票获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这种政体中，商业利益是唯一的政治动机，政治生活成了人的自然欲望的玩物。这种新式政体来自于基督教分裂导致的国家内战：为了摆脱宗教内战，英格兰最聪明的智识人（斯威夫特指的是霍布斯和洛克）设想出了一种以实现个人自由而非以实现美德为取向的政治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存自然性命及其私有财产。斯威夫特用“小人国”来指代英国的君主立宪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十分切合现代自由主义政制观念的品质——灵魂的渺小委琐。当然，在一个比如说伏尔泰这样的崇今派眼里，情形并非如此。1733年，伏尔泰流亡英国期间（1726—1728）动笔写的《关于英格兰

国族的书简》（*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在伦敦出版。此书仅比《格利佛游记》晚七年，由于伏尔泰是个崇今派（或者说由于他的灵魂类型），他对英国新政的见解与格利佛有天壤之别。

在第二卷里，格利佛记叙的出海流落地是一个名叫Brobdingnag（布罗丁奈格）的“大人国”，那里的人不仅身材高大，而且心性高尚，民风淳朴。这是一个尚未经现代革命的古老的君主制王国，“属地之内没有宗教纷争或者战火连绵的历史。他们唯一的政治难题是古老而自然的君主、贵族与民人的冲突，这也已经在很早之前就通过建立一个均衡的政体解决掉了”。显然，格利佛笔下的“小人国”与“大人国”形成的对比，是现代民主政体与古代君主政体的对比。

奇怪的是，格利佛在“小人国”时是个高大的人，他看不惯“小人国”的方方面面，“小人国”中人也看不惯他，甚至他的家人和朋友们也会认为他的行为举止莫名其妙。与此相反，格利佛在“大人国”则是“小人国”的代表，“大人国”的国王把格利佛放在手掌心上与他谈话，询问他属于代表商人和金融贵族以及其他新生资产者上层的辉格党，还是属于代表大地主和门阀贵族利益的托利党。格利佛在书中的这种角色变换，与其说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国度的身份不同，不如说表征的是同一个国家的知识人的分裂。如《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在一开始所说，如今，一个“智识国家”的读书人分裂成了崇今派和崇古派——格利佛表征英国知识人，但英国知识人分裂为两派。于是我们看到，来到“小人国”的格利佛通过描述利立浦特的古代政制向新的君主表明，古代的利立浦特并非“小人国”。这个国家变得渺小委琐，是“光荣革命”的结果。显然，这个格利佛是英国知识人中的崇古派。与此相应，我们在第二卷看到，格利佛向“大人国”的国王介绍自由民主新政（同样是在第六章）。听完格利佛叙说英格兰晚近一个世纪的大事记后，“大人国”的国王对格利佛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一再被人引用：

这些大事只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屠戮、革命或流放。这都是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大恶果。

对于英国走向商化民主政制，“大人国”的国王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你的同胞中，大多数人都是大自然让它们在地面上爬行的最可憎的害虫中最有害的一类。

“大人国”的国王拒绝了“爱自己的国家”的格利佛提出的有利于“大人国”现代化的建议，理由很简单：“爱自己的国家”的含义是“爱”现代式的自由民主政制，不爱这种政制等于不爱国。那样的话，“大人国”就会跟着英国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国”。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格利佛已经描述了如今我们称之为导弹甚至原子弹一类的新式武器，以此证明英格兰的新政制何等先进。但是，这个格利佛清楚地知道，他所代表的新国家与“大人国”的差异最终在于“好品德与坏品德的观念”。他认为，“大人国”的国王闭关自守，满脑子偏见和狭隘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在我国以及欧洲的文明国家却根本不可能产生”，因此他说：“如果把住在这样遥远的地方的一位君王的好品德与坏品德的观念当作全人类的标准，当然很难令人接受。”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斯威夫特笔下的“大人国”很像我们的古代，因为，卷二中的格利佛针对“大人国”说的那些话，与我们如今的一些知识人对自己的国家说的话一模一样。而且，他们也像这个格利佛向“大人国”讲述英格兰近代大事记那样，通过翻译更为详备的英国史向自己的国家推荐英国模式。在把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的今天，《格利佛游记》的确不能算作一部极端反动的书。毕竟，第二卷中的格利佛提出了新的“全人类的标准”或者说新的“普世价值”：一个人相信自由和民主就是好品德，不相信这种价值就是坏品德。

如果说《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突显的是读书人的灵魂品质的优劣，那么，《格利佛游记》突显的就是政治制度的品质优劣——如布鲁姆所说，在斯威夫特看来，古代政体具有“对秩序的远见”。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的说法，灵魂品质的优劣就像大人高过小孩。因此，“小人国”与“大人国”的对比，首先是灵魂品质优劣的对比。何况，读书人个体灵魂的品质与国家政制的品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柏拉图

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所说，有多少灵魂的类型就有多少类型的政体。苏格拉底区分了五种灵魂类型，与此相应也就区分了五种政体。即便不能说《格利佛游记》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仿作，也得说《格利佛游记》延续了《理想国》中的问题。与此相反，无论伏尔泰的《关于英格兰国族的书简》还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抛弃了《理想国》中的问题。

格利佛记叙的第三次出海是在1706年动身的，这次到的地方不止一个，而是五个。首先到的是一个叫作Laputa（拉普塔）的岛屿，由于这个岛屿“似乎能随意升降，或者向前移动”，格利佛称之为“飞岛或者浮岛”。格利佛发现，这个岛的国王是个精通数学的天文学家，国家的主要阶层也是这类人。这个飞岛国的国王对格利佛所到过的国家的法律、政府、历史、宗教和习俗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他看来，政治的事情很简单，如果哪个城邦发生动乱或叛乱或剧烈政争，用天文学方式处理易如反掌——“只要国王能说服他的内阁和他合作，他就可以成为宇宙间最专制的君主”。显然，这个飞岛的政制基于现代天文学原理，它表征的是新理性科学废除传统生活方式的雄心和自信。

格利佛随后发现，飞岛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支配好些岛国（都是飞岛），首都是“拉格多”（Lagado，据说隐射伦敦）。格利佛乘坐飞行的拉普塔岛来到首都拉格多的所在地巴尔尼巴比，下降到岛上以后，格利佛在首都停留期间受到殷勤款待。这个城市是设计家的家园，最重要的地方是科学院。当格利佛走进科学院时，发现全是搞各种试验的实验室——其中一间挂满了蜘蛛网，带领格利佛参观的人高声尖叫，要格利佛千万小心别碰乱蜘蛛网，因为科学家们正在试验用蜘蛛代替蚕抽丝这一古老传统。如果我们事先读过《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就会知道，这一试验所具有的现代含义是什么。由此来看，通常把斯威夫特笔下的飞岛理解为“乌托邦”是错的，毋宁说，格利佛所到的飞岛是崇今派头脑中的王国，它并非乌有之乡，而是崇今派的智性之乡——培根笔下的“新大西岛”。看来，斯威夫特的笔法是，通过卷一和卷二比较“小人国”（民主政体）与“大人国”（君主政体）的品质之后，《格利佛游记》进一步探究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商业化民主国这种理想政制是由什么样的头脑设计出来的。换言之，卷三的铁岛之行深化了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的比较：如果说“大人国”政体追求

的是常识性的道德德性，那么，“小人国”政体追求的就是技术知识所带来的舒适和快乐。

格利佛还发现，飞岛上的科学家对政治和时事非常关心，讨论国家大事或一个政党的主张时，非常激烈，寸步不让。显然，飞岛上的科学家们认为自己才真正懂政治，而且有特殊权力去改造所有传统的政治，因为他们有新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实验理性原则确立了新史学。不用说，对于摧毁“大人国”来说，这门学问比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火力大得多、管用得多。

参观过飞岛京城的科学院后，格利佛本来要去另一个飞岛拉格奈格，在马尔当纳达港转船时，由于一时没有班船，当地一位高贵的绅士建议格利佛去附近一个名叫格勒大锥（Gludubdribb，其含义是“巫人岛”）的小岛看看。到了那里以后，格利佛发觉自己到了一个极为古怪的地方，因为那里经常出没许多古人的魂。原来，这里是现代式的新史学专门处理古人英魂的地方。格利佛用了第七、八两章篇幅来讲述在“巫人岛”的经历和见闻。他首先要求见荷马和亚里士多德，并希望也见见给他们做评注的后人。这种人一来就是好几百，由于惭愧自己对荷马和亚里士多德胡说八道，他们都躲得远远的。荷马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些后人大发雷霆，说他们的灵魂缺乏理解高贵精神的品质。格利佛特地还让他们请来笛卡尔和伽桑迪，这两位当着亚里士多德的面承认自己“在自然哲学方面”犯了错。

最让格利佛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的现代式新史学家人数太多，他们“像娼妓一样哄骗世人”，颠倒黑白地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写成“最卑鄙的流氓和卖国贼”——反之亦然，把历史上“最卑鄙的流氓和卖国贼”写成了了不起的诗人政治家。如今好些学人都惊讶，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利佛能够准确预见到辉格党式史学的出现。甚至我们中国学人也难免惊讶斯威夫特预见到了当今的新史学笔法。不过，最让人觉得斯威夫特的飞岛记具有历史预见性的是，格利佛后来发现，各个飞岛虽然有海洋隔开，从地理上讲其实是一个大陆，它“向东一直延伸到美洲加利福尼亚以西的无名地带”，通过拉格奈格岛，这个大陆还与日本“结成了亲密的同盟”。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个飞岛大陆有如“英美”世界，如今的《美日安保条约》就像是拉格奈格岛与日本结成的“亲密同盟”的进一步巩固。